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1.05.008

历史意识与自我认同： 论《大黄蜂》的听觉叙事

邓桂英

(湖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1)

摘要:在《大黄蜂》这一叙事文本中,彼得·汉德克借助多人称视角变换和个人型叙述声音与作者型叙述声音的同时融入,营造了多重叙述声音,同时通过塑造丰富的声音意象,使作品呈现出多样的声音景观。彼得·汉德克融历史意识与自我认同为一体,通过听觉感知的书写,将特有的声音景观潜藏在对记忆的追溯中,将个体感受与现实和历史的内部相联系,并由此探索历史的意义,积极追寻新的个体身份与民族身份认同,展现了一个极其广阔的内在表现空间。

关键词:《大黄蜂》;历史意识;自我认同;听觉叙事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1)05-0059-07

2019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彼得·汉德克是一位极为成功也颇有争议的作家。二战后急遽变化的形势,使彼得·汉德克试图解构传统文学叙事模式,探索新的文本结构形式,尝试从全新的角度表达对自己、世界和社会变迁的思索。彼得·汉德克的长篇小说《大黄蜂》借助大量“声音”元素的表达,创造了特殊的文本模式,传达了特定的文本意义。近年来,听觉文化研究异军突起。伴随着听觉文化转向,听觉叙事也日益受到关注。但国内学界已有的彼得·汉德克研究成果多集中于对其创作的反传统倾向的研究,还鲜有对其小说中的听觉现象及其呈现的听觉世界的关注。在学界关于彼得·汉德克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笔者尝试结合傅修延的听觉叙事理论^①,捕捉《大黄蜂》这部小说中的各种“声音”现象,剖析小说中的“叙述声音”,“聆听”小说中“声音景观”,进而探寻小说文本听觉叙事的深层意蕴与审美价值,以期对彼得·汉德克小说的研究提供新的理论视角,助力听觉叙事批评实践的推进。

一 多重的叙述声音

二战带来的难以言说的创伤与困惑,至今无法消弭。“战后的两德时期,政治话语将不能公开讨论的德国人受害记忆挤压到个体或个体家庭的层面……而文学作为存储和传播个体记忆并使之进入集体记忆领域的媒介为被压抑的受害记忆和受创经历提供了释放的空间。”^②汉德克通过文学这一载体,在《大黄蜂》中以后现代非线性叙事方式,借助多人称视角变换、个人型叙述声音和作者型叙述声音的同时融入,使得小说叙述声音不再单一化而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大黄蜂》的多重叙述声音重筑了二战的民族性、反思性记忆,展现了对历史真实的体认和探寻。

(一) 独特的叙述视角

为了重筑二战记忆,《大黄蜂》将历史与想象、现实与虚构相结合,在“故事的故事”中运用了碎片化的叙事结构和非线性叙事方式,呈现出后现代叙事风格,叙事零散,能指滑动,时空交错。整部小说由67个并非连贯和完整的片段拼贴组

收稿日期:2021-05-18

基金项目:湖南省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8YBA145)

作者简介:邓桂英(1980—),女,湖南湘乡人,博士,讲师,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

^①傅修延在《听觉叙事初探》《论音景》《论聆听》等一系列文章和《听觉叙事研究》一书中建构了听觉叙事研究理论,阐明了“聆听”“音景”“叙述声音”等重要概念。

^②刘海婷:《德国战后文学中的“记忆话语”》,《文学教育》2016年第11期。

合而成,既是一部回忆过去的小说,又是一部“讲述小说的小说”,故事里套故事。显而易见,小说的中心事件是主人公格奥格尔独自上路寻找溺水而亡的兄弟马提亚斯并因此失明,但小说中的这一中心事件被不同叙述者在不同时间、从不同视角反复述说。小说的叙述者身份因此显得游移不定而又模棱两可,读者常常很难区分清楚小说中的人物、叙述者和作者。

一方面,叙述主体以当下的对现实世界的观察和认知有意识地评价过去的诸多经历和剖析书中的种种情节,以现在视角叠加过去视角。“叙事者一边回忆过去读过的一部小说,一边回忆过去发生的事,一边加入当下的认知和感受。这样,当下的‘真实’感受、对过去的回忆、对那部小说的复述,加之叙事者对上述各项的评论、对叙事本身的点评,便错杂交汇在一起。”^①由于叙述者对小说的回忆、对自身经历的回忆、对现实当下的感知、对叙事方式本身的评判交错杂糅,因此叙述者与被叙述者之间可以互相转换、合二为一,叙述声音在现在和过去之间自由穿梭。

另一方面,作家借助代表叙述者的人称代词的不断变化,使得叙述视角多次不断在第一人称内视角(“我”)和第三人称外视角(“主人公”“叙述者”“他”)之间转换,模糊了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叙述、叙述者与主人公之间的边界。《大黄蜂》的开篇“回忆的开始”里,叙述者开始以“我”开启个人回忆。第一人称“我”视角的故事讲述,让读者仿若置身于故事情境,亲临人物现场,得以靠近人物、触摸人物,与人物处境产生共鸣。而至“逃亡”这一部分,叙述者开始讲述另一部小说。因此,接下来,之前代表叙述者的第一人称“我”在“隐瞒消息”这一部分里被转换为第三人称“主人公”,而在“警察的话”这一部分里“我”甚至又被直接称呼为“叙述者”,第一人称内视角被切换为第三人称外视角。不仅如此,在叙事过程中,叙述的“我”、回忆的“我”、小说的“我”彼此关联又彼此相异。如,作品中“我”与“主人公”之间突然而

至的切换,“此时主人公正带着他的消息走上阶梯”^②“一开始,我正往楼上走……最后强忍住自己,隐瞒了这个消息”^③。再如,“我”与“叙述者”之间频繁发生的切换,“当警察迈着大步朝叙事者走过来时”^④“警察问了三次我的名字”^⑤。人称的突然改变,“我”的频繁切换,意味着叙述者的改变,不同叙述人称的选择带来叙述视角的巧妙变换。叙述视角的转换打破了时空的限制,导致人物与故事距离的变化,使得现实与虚构、历史与想象之间的界限不再清晰。

(二) 动态性叙事格调

小说没有将叙述视角固定在某一个叙述者身上,叙述视角的多变产生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交互叙述,创造了多维的叙述声音,读者的审美距离也随之发生变化。根据著名学者苏珊·兰瑟在《虚构的权威》中提出的作者型声音和个人型声音这两个关于叙述声音的重要概念,我们不难发现,《大黄蜂》同时融入了个人型叙述声音和作者型叙述声音。在《大黄蜂》中,由“主人公”“叙述者”发出的类似第三人称外视角的叙述声音可以说是小说作者汉德克借助人物发出的作者型叙述声音。这种“异故事的,集体的并具有自我指称意义的叙事状态”^⑥的叙述声音较之第一人称叙述的“那些有意讲述自己的故事”^⑦的个人型叙述声音拥有更大的理性发挥判断的空间,可以制造一种间离效果和审美距离。作者利用将故事叙述和体验融为一体的同故事叙述的第一人称叙述构筑故事的真实性,而借助异故事叙述的第三人称叙述打破认知局限将个人记忆书写引至历史的反思。读者由此摆脱叙事的控制,重启判断,深化认知。这样,小说文本便可以通过个人历史的书写引发读者对历史真实和社会现实的理智反思。这种动态性叙事格调摒弃了传统的叙述者的单一视角,打破了读者对真实历史的认知桎梏。其所具有的极大的叙事张力使得叙述者的战争记忆就不仅仅是生命个体在战中和战后所经历的创伤事

①聂军:《消解虚拟叙事,重现真实感受——解读彼得·汉德克的小说〈大黄蜂〉》,《国外文学》2012年第4期。

②彼得·汉德克:《大黄蜂》,聂军译,载《无欲的悲歌》,顾牧、聂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32页。

③彼得·汉德克:《大黄蜂》,聂军译,载《无欲的悲歌》,顾牧、聂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32—136页。

④彼得·汉德克:《大黄蜂》,聂军译,载《无欲的悲歌》,顾牧、聂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47页。

⑤彼得·汉德克:《大黄蜂》,聂军译,载《无欲的悲歌》,顾牧、聂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48页。

⑥苏珊·兰瑟:《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黄必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页。

⑦苏珊·兰瑟:《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黄必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2页。

件,还指向小说文本之外德意志民族关于二战的痛苦的集体记忆。被唤醒的无数个人记忆承载了一个民族痛楚的集体记忆。因此,文本的叙事效果也随之被最大化。

汉德克坚持真实性写作原则,他认为,叙事艺术的本质在于表现作家的真实感受、事物的真实状态以及表现的真实手法。从决定成为一名职业作家开始,汉德克就下定决心要做一个“生活在象牙塔里的具有绝对意义的作家”,而绝非一个“内心在社会化和文化工业中自甘堕落的作家”,因而,他希望自己一方面能够自觉反省内心,另一方面则能够“重新发现不再能感受到的真实,从而刺激读者对真实早已麻木的反映”^①。固定视角往往会让读者对作品叙说的故事的真实性产生怀疑,故在《大黄蜂》中汉德克摒弃了固定的叙述视角,而借助多人称视角变换、模糊叙述者和主人公等手法加强事件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增加叙述的亲切感和可靠性。《大黄蜂》独特的声音叙事策略,正是汉德克真实性写作原则与直面现实的文学追求的一次深入实践。

二 多样的声音景观

在《大黄蜂》中,汉德克除了通过营造多重叙述声音描述了二战给民众带来的心灵重创和折磨,还打破以视觉图景为主的描写手法,通过对声音意象的描绘塑造多样的声音景观,创造了一个可以倾听自己内心声音的深刻世界,以“更新对世界的知觉”“破除人们习以为常的世界观念,摆脱似乎理所当然的判断事物的标准”^②,从而进一步激活深度认知,重筑民族记忆。仔细阅读和分析文本,我们不难发现《大黄蜂》这一叙事作品,描述了各种不同的声响,塑造了丰富的声音意象,呈现出多样的声音景观,表现了作家深刻的感受力,也为读者打开了感知的新途径。

(一) 乡村音景

在《大黄蜂》这部作品中,汉德克描述了各种各样的声音,有自然声,也有人为声^③。自然声主要包括自然环境下的风声、雨声、水声、动植物发

出的各种声响等等。如小说中,苍蝇的嗡嗡声、狗的尖叫声、猫的呻吟声、马的嘶叫声、沙子纷纷落下的簌簌声、碎石子的当啷声、沙子和碎石子在筛子里的唰唰声、风吹窗帘的嗒嗒声、沙粒敲打玻璃的嚓嚓声、衣柜门的嘎吱声、雨水的噼啪声、风把铁轮箍从仓库墙上吹落到院子里的当啷声、风吹湿草地的嘶嘶声、自行车松动的挡泥板的啪嗒啪嗒声、绷紧的铁丝在风中的唧唧声、挂在铁丝上的湿衬衣发出的啪啪声、院子的柴房门碰到木板堆的噼里啪啦声……这些自然声意象俯拾即是。人为的声音则包括语言、音乐以及人类居住环境中的各种声音等等。如小说中,喇叭里传来的宣战声、空袭警报声、炸弹的轰炸声、拖拉机爬坡时发出的突突声、火车行驶的呼啸声、汽车驶过的隆隆声、啃苹果的咔嚓咔嚓声、放映机器里的嘶嘶声、街道上乱哄哄的声音、人们的嚷嚷声以及悲泣哀号或欢声笑语、鞋底在潮湿的沙地上发出的嚓嚓的声音、教堂钟声、炉子开关的咔嚓声、指间沉闷的汲水声、水龙头下喝水口腔里发出的咕咕声、嘟囔声、吼叫声……比比皆是。汉德克通过各种拟声词对这些独特的原声进行模仿,其中很多声音作为基调音部分地建构了乡村的日常生活世界,联系着最真切的生活体验和最真实的生活方式。此类“听声类声”的原声模仿对事物的描写往往细腻而又充分,读者得以通过“高保真”的声音景观真切地感受到大自然场景和日常乡村生活。其所具有的生动传神的表现力,使人物对声音的感知构成了真实感受的一部分,也重新激活了读者贮存在脑海中的声音记忆,唤醒了一个记忆的、经验的世界^④。

声音的写实模拟烙着生活的鲜活印痕,重现了汉德克对家乡的回忆。无论大自然的声音是优美和谐还是喧嚣嘈杂,无论这种日常生活是幸福或是悲伤,在朝向故乡家园的记忆书写中,这些熟悉的乡村音景就是过去生活状态的见证者,这些细腻的原声模仿连接着消失在时间另一端的生活。

(二) 情感音景

声音是人情感的外化。听觉叙事不但可以打

①陈民:《彼得·汉特克——通向自我和世界图像的神圣之旅》,《外国文学动态》2002年第3期。

②章国锋:《天堂的大门已经关闭——彼得·汉德克及其创作》,《世界文学》1992年第3期。

③此处对《大黄蜂》中声音的分类主要是依据傅修延在《听觉叙事研究》一书中从声源角度对声音的划分。可参阅傅修延:《听觉叙事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75页。

④吴晓丽,刘立辉:《卡森·麦卡勒斯小说的声音叙事》,《江西社会科学》2020年11期。

造时空感,而且可以传情达意,塑造人物心境、性格。汉德克通过对各种听觉情境的描绘,展现人物内心情感,烘托人物情感脉络,描写人物心路历程,进而推动整个故事情节的发展。如:弟弟尸体被送交到家时,作者用“母牛嚼草料时牙齿的咯吱声”“女人们祷告时发出的哀泣和颤抖”“马厩里那匹马的嘶叫声”等各种声音衬托父亲当时异乎寻常的忧伤和痛苦。当抬着弟弟尸体担架的士兵进屋时,父亲再也克制不住,“突然朝马厩里大喊起来,命令这匹马停止那没完没了的撒尿”,随之又说“恨不得打自己一个嘴巴”,但父亲没有这样做,而是“嘴里嘟囔了几句,让士兵们穿过敞开的房门,走进屋里”,士兵们则“尴尬地听着他愤怒的吼叫”,父亲最后只是“没完没了地磕打着鞋子”,对儿子们“连一句话都没有说”^①。在这段听觉情境的描写里,汉德克敏锐地抓住了特定环境中声音的特质,巧妙地利用声音传情达意。他将“母牛嚼草料时牙齿的咯吱声”“女人们祷告时发出的哀泣和颤抖”“马的嘶叫声”“四处乱溅,又是啾啾作响,又是噼噼啪啪”的马的撒尿声和父亲的大喊声与嘟囔声、对士兵们的愤怒的吼叫声、面对儿子们的沉痛无声等多种听觉意象组合在一起,通过细致入微的声音情境描写渲染情绪气氛,刻画了冷酷残忍的现实,向读者传递父亲无以言说的丧子悲痛和对没完没了的战争的愤怒和无奈,让读者对人物那时那刻艰难和绝望的心情感同身受。再比如,作品中这样写道:“雪停了以后,呼喊的人会冻坏舌头的。当时,他从白天到晚上都在荒芜的雪地里跑来跑去,呼喊着,张望着,寻找下落不明的弟弟。”^②在弟弟马提亚斯失踪以后,哥哥格奥格尔不顾一切四处寻找,哪怕雪后的呼喊可能冻坏舌头,他依然从早到晚在雪地里不停地呼喊和寻找。此处雪地呼喊的听觉意象的运用所构筑的听觉情境,生动地传达了哥哥急切寻找弟弟的执着、痛苦和无助。声音的叙写使情感的表达充分鲜明却又不失委婉悠长。汉德克借助听觉情境更好地渲染和烘托出了人物的情感氛围和心理特征。

这些听觉描写紧密联系着作品中人物的心理

情感与生存状态,而人物个体所经历的悲哀和无奈也承载着无数人痛苦的战争受难记忆。作者注入声音文本中的情感动力,会引导读者自然而然进入“心听”状态。在听觉叙事所塑造的情感声音景观里,作品的叙事空间也得以进一步丰富与拓展。

三 深层的叙事隐喻

《大黄蜂》里,这种种自然的、人为的声音既是情景性声音,也是集体听觉意象,而绝不仅是作家对自然和人世客观声响的简单复制重现,也并非独有的个体听觉体验,这多样的声音景观带着深厚的情感意蕴和文化意味。汉德克通过对过去感知的声音的描摹和再现,激发记忆、引发想象、带动情感,在深层的隐喻维度上,达到连接历史与现实、认识自我与世界的目的。通过分析这些声音景观,我们仿佛亲临那个年代和地域的听觉现场,可以了解这些发声者的生存境遇,从中揣摩作家的创作意图,揭示出听觉叙事在表达作家情感和深化叙事主题上的重要意义。

《大黄蜂》的叙述者同时又是小说的主人公——失明的格奥格尔。小说以格奥格尔为第一人称叙述者,从一个盲人的视角回忆童年和历史,讲述战争时期的变幻无常。失明虽然意味着视觉受到限制,但却能使人将注意力全部集中于倾听,可以更加用心地去倾听那些被现在的我们所忽视的声音,获得更为真实的洞察和全面的感知^③。因此,视觉感知的缺位使听觉占据了绝对的优势。“他摸到的东西和听到的声音帮助他征服了这个失落的世界。”^④作品中的这句话无形中流露出汉德克对视觉中心主义的质疑和对听觉感知的倚重。他借助失明这一意象,凸显听觉感知,呼唤聆听意识,意欲通过失明的“观察者”的叙述和回忆,回到历史本身,再现隐没的历史真实,也借此进入关于现实生存的哲理性思考。

(一) 无形的战争“音墙”:为历史发声

虽然《大黄蜂》里并没有对于硝烟弥漫的战争场面的直接的正面的描写,但是在作品所创造的听觉世界里,读者似乎能嗅到前线的硝烟味。喇叭里传来的宣战声、飞机飞过的声音、空袭警报

①彼得·汉德克:《大黄蜂》,聂军译,载《无欲的悲歌》,顾牧、聂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83—484页。

②彼得·汉德克:《大黄蜂》,聂军译,载《无欲的悲歌》,顾牧、聂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76页。

③聂军:《消解虚拟叙事,重现真实感受——解读彼得·汉德克的小说〈大黄蜂〉》,《国外文学》2012年第4期。

④彼得·汉德克:《大黄蜂》,聂军译,载《无欲的悲歌》,顾牧、聂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60页。

声、炸弹的轰炸声,构筑起了一堵无形的战争“音墙”,主导着人的听觉,一下子拉近了读者与战火的距离;再加之作品中有意无意提到有落到学校和电影院的炸弹、从天空滚滚而来的轰炸机、踩到的子弹壳、父亲干农活的地方炸弹四起等,读者仿佛在字里行间听到了这些让人倍感煎熬的战争声响,能真切地感受到人物艰难的战时处境和战争所带来的毁灭性的影响。《大黄蜂》以二战时期的创伤记忆编织而成的听觉型文本来为个体与民族的历史发声,是在深层隐喻的层面对二战的再思考。在虚实杂糅之间,《大黄蜂》透露出深厚的历史意识,投射了汉德克求真质疑、不忘过去、渴望和平的历史观念。

轰炸机声音是二战中最典型、最具代表性的一种声音,有着浓郁的感染力。《大黄蜂》借助这类声音的呈现唤起经历二战的群体对于战争的共有情绪感知。“……忽然听到一种吓人的轰隆声”^①“他们一听见那越来越大的声音时,就立刻钻进玉米地里,双手护着脑袋,而这轰隆声从地平线上冲过来……”^②“当弟弟们第二次听到那轰炸机一样的声音时,就朝那儿望着发愣,一双呆呆的眼睛就像被什么东西刺了一样。嘴里还没有咽下去的东西在脸庞后笨拙地堆积着、蠕动着。……他们用力屏住呼吸,脸色憋得涨红。”^③轰炸声在作品中的反复出现激起了人们关于战争的更多印象与想象。这绝非声音的简单记录,更似一种隐喻连接历史与现实。不绝于耳的轰炸机声音就如大黄蜂嗡嗡作响挥之不去,这种个人的声音记忆也自然而然地唤起了德意志民族关于战争的集体记忆,凝结成一种具有集体共识性的声音意象,内蕴着对二战历史的深刻反思和批判。“历史是安放民族心灵的天地,历史的保存在于后辈的记忆。不然,后辈会永远失去历史,心灵也就会永远处于漂泊之中”^④。这些战争声音记忆的重现,让读者进入到作品的声音世界中,一起经历着战争,继而认识历史、正视历史、反思历史。作家尝试借此唤起群体文化身份认同,塑造族裔集体意识,强化民

族凝聚力。

家庭因素、生活环境和成长经历使得“二战”成为汉德克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成为其日后写作绕不过去的关键词。对“二战”这一历史文化记忆展开反思和批判,是汉德克作为其所在时代的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责任所在。“让事件与所有人都相关”^⑤,面对任人言说的或者空白的民族历史,汉德克用不断转换的叙述视角创造复杂的叙述声音,用战争声音记忆的再现重启激活读者对过去的真实认识。德里达说:“唤起记忆即唤起责任。缺少一项,怎么思考另一项?”^⑥汉德克对二战历史的叙述的目的在于通过记录个体记忆叙述个体历史,重新构筑关于二战的创伤性记忆,并将个体的战争创伤记忆激活为集体的痛苦记忆,借助个人与过去的连接,再现故国之患与生存之艰,还原历史与补充历史。“遗忘或许能带来轻盈的生存,只是这种‘轻’带来的是迷失的虚无”^⑦。而只有获得关于历史和过去的认知,我们才有可能走向未来。这是汉德克用一段段鲜活的回忆片段给予我们的启示。

(二)逝去的乡村“天籁”:抒发无解的乡愁

汉德克通过回望式写作,借助乡村音景再现,不仅生动地探求了德意志民族所关注的历史之维,更着力于平常环境的声音描述,展现社会变迁和世间万象,倾注了现实境遇中的生存诉求。

用听觉感知生活、激活回忆,意味着重启对生活的再体验和新感受,从中捕捉生活感受中的真实。夜里火车的声音、市区有轨电车的声音、长途载重卡车的声音、马达声、钢轨声、鸣笛声、扳岔道声、蒸汽机声、拖拉机爬坡时发出的突突声、汽车驶过的隆隆声、放映机器里的嘶嘶声、街道上乱哄哄的声音……这些乡村音景中的刺耳的声音信号揭示了二战带来的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变化,冲击着读者的心灵,也使读者对当下的社会氛围和人物的生存境遇感同身受。“一个人从汽车的声音里就能听出,他是正穿行在一个房屋林立的地方,

①彼得·汉德克:《大黄蜂》,聂军译,载《无欲的悲歌》,顾牧、聂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68页。

②彼得·汉德克:《大黄蜂》,聂军译,载《无欲的悲歌》,顾牧、聂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68页。

③彼得·汉德克:《大黄蜂》,聂军译,载《无欲的悲歌》,顾牧、聂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69页。

④黄万华:《在旅行中拒绝旅行:华人新生代和新华侨华人作家的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0页。

⑤彼得·汉德克:《大黄蜂》,聂军译,载《无欲的悲歌》,顾牧、聂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28页。

⑥雅克·德里达:《多义的记忆——为保罗·德曼而作》,蒋梓骅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⑦池慧仪,杨金才:《〈零〉:后“9·11”美国的忧郁与哀悼》,《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还是正走在一片旷野上。……城市里的街道发出的回声和乡村不同。”^①机器轰鸣、众声喧哗的现代工业文明摧毁了田园牧歌般和谐的乡村音景,工具理性、机械主义、战争造成人性的异化和冷漠,宁静美好的乡村日常已经一去不复返。这既是从听觉表现对象感受的真实,又是能感知到的真实世界的现实。作者通过城镇化的声音叙事,展现了现实社会形态,表达了对战后现实生存的感知与反思。

声音的在场与缺席往往隐喻着当下生活的真实状态。在工业化的现实社会形态里,一边是喧嚣的城镇化的声音不绝于耳,一边是熟悉的大自然的声音悄然而逝,由此伴随的是人们生活的窘迫和艰难。“一个雨夜之后,路上到处躺着死去的蛤蟆……夜里,可以看见蛤蟆在汽车灯光下笨拙地——这也是它们天生的走路方式——连爬带跳穿过马路,数不胜数,没完没了。一旦它们被轧死在路上,那姿势就像登山者攀岩壁时的姿势一样。”^②“那些被轧扁在公路上的蝗虫头部和那些凸出来的、完好无损的后半身让他感到极大的愤慨,深深刺痛了他,就像一场捧腹大笑之后肋下疼痛的感觉那样。一辆小轿车疾驶而过,一阵风惊动了那些蜷曲着的动物,惊动了蝗虫和那些趴在地上的蛤蟆,吹得它们身体翻腾,卷进了风里。那些没有被轧成肉酱粘在路上的虫子吓得连滚带爬,四下逃窜,卷入汽车尾部的气流中。”^③这是格奥尔格行走在寻找弟弟的乡路上看到夜雨之后路上到处躺着死去的蛤蟆和被轧扁在公路上的蝗虫的一段描写。这些描写虽然没有对蛤蟆和蝗虫原声的直接模拟,但读者仿佛能感受到汽车疾驰而过的喧嚣、虫子凄惨绝望的叫声、弥漫着死亡气息的世界和那一颗颗浮躁得就像长满了荒草的心灵,其描写背后的隐喻层面的意义值得深思。蛙鸣虫叫是一种乡村生活的基调音,这些熟悉的声音景观给人创造出一种归属感和认同感,在乡村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耳边听着蛙鸣虫叫,这是一种内心坦然的、与世无争的宁静与安详。这些此起彼伏、连绵不断的蛙鸣虫叫陪伴

人类走过了漫长的岁月,人们对蛙鸣虫叫有着发自内心的向往,一种对乡村田园牧歌生活的美好向往。当蛤蟆被疾驶而过的汽车轧死在路上,当蝗虫要么被轧成肉酱粘在路上要么被卷入汽车尾部的气流中,它们和现实社会中那些在城市里东奔西走,躲避车辆扬尘疾走了多如虫蚁的人们,又是多么相似。蛤蟆和蝗虫的命运正隐喻着以汽车为代表的现代工业文明对大自然乃至一切的破坏和摧毁。这一切无不是民族历史和命运的隐晦的投射。

小说借助对家乡这一听觉空间的模糊不清的追忆,诉说着对家园的怀念和对归属的向往,满蕴着一腔无解的乡愁。那些从前的日子,那些远去的蛙鸣虫叫,唤起饱含乡愁的图景,召唤了一个失落的、记忆中的世界。汉德克人生早期体验的乡村生活,中期经历的战后反思和后期面对的繁荣的工业社会,使他在批判审视二战这段历史的同时对工业文明流露出回忆的创伤和难以摆脱的绝望。在他看来,人类不仅亲手制造了二战这一暴行,还用其他自我毁灭的行径,给自己带来毁灭性的灾难。乡村的“天籁”和安宁的生活,不该是仅仅停留于记忆中的存在。汉德克通过声音来表现真实生活和真实感受,用乡村音景构筑了对家乡的想象性重构,将自己对人类困境和命运的思索渗透其中,引起人们对后工业时代人的异化和生存环境危机的深思。

(三) 孤独寻找之旅:道尽艰难的认同

汉德克的记忆重塑和听觉叙事同时也聚焦人的自我认知,探求个人能否突破桎梏,完善自我认知,重塑主体认同。现有汉德克的相关研究已表明《大黄蜂》与作家亲身生活经历之间有密切关系,《大黄蜂》带有明显的自传色彩^④。吉登斯认为:“自传的思维是自我治疗的中心因素。对于个人生活连贯感的发展,历史是一种主要的手段,它有益于逃避过去的束缚和敞开未来的机遇。”^⑤汉德克对于战争历史与社会变迁体验的自传性言说最终指向自我追寻。然而这条自我寻求之路也因背负着个体与民族的共同的创伤性感受与记

①彼得·汉德克:《大黄蜂》,聂军译,载《无欲的悲歌》,顾牧、聂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73页。

②彼得·汉德克:《大黄蜂》,聂军译,载《无欲的悲歌》,顾牧、聂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70页。

③彼得·汉德克:《大黄蜂》,聂军译,载《无欲的悲歌》,顾牧、聂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72页。

④聂军:《消解虚拟叙事,重现真实感受——解读彼得·汉德克的小说〈大黄蜂〉》,《国外文学》2012年第4期。

⑤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82页。

忆,尤显艰难。

主人公格奥格尔孑然上路寻找溺水而亡的兄弟马提亚斯,这一基本叙事线索具有强烈的象征意味。记忆是身份的重要表征。破碎的记忆意味着自我身份的不确定性。作者用虚实相间的、凸现听觉感知的碎片式记忆表达了身份的不确定性和自我认同的艰难。正如作品中所写“我问我自己是谁”^①,现实的生存处境中,人们迷失了自己,不知道自己“在哪儿”“要干什么”。查尔斯·泰勒曾指出:“正确地理解现代性,就是实施拯救活动。”^②寻找弟弟,实际是在寻找自我,是在对那个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失去归属感、在现代内在性的焦虑中迷茫而困顿的自我展开审视与追寻。主人公格奥格尔的上路,是踏上人性思索、个体寻根、家园寻找之旅,表征着自我身份的重构和自我回归的努力。“他走在他认为自己走的路上。为了自己,他越过重重障碍。”^③格奥格尔行走在寻找弟弟的乡路上,表现着一种坚守与寻找,一种面对历史的困惑和选择,也展现出对于二战的罪责及其思想根源的思考。而主人公寻找的最终目的也许只有一个——如何在寻找的过程中找到一种战胜过去的方法,从而真正回归自我。“叙事就是作者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把人生经验的本质和意

义传示给他人。”^④汉德克正是围绕有着自传相似性的主人公对弟弟的寻找,讲述了一个关于失落和寻找的故事,在声音的描摹和记忆的再现中,展开了一场回归自我的身份诉求之旅,反映了人类被工业化控制的生活状态和家园感的缺席,含蓄巧妙地传达出小说文本蕴藏的特殊意义。

结语

《大黄蜂》是一部充满“声音”的文学作品。彼得·汉德克融自我认同与历史意识为一体,以复杂多样的叙述声音、富于象征意味的声音景观,叙述了自我与民族的历史与过往,敞开了对自我与社会的反思,凸显了文本的特定意义。在个人体验与感伤情绪背后,《大黄蜂》深蕴着对历史真实的重新认知、对现实的深刻思索和对自我的执着探寻,散发着独特的艺术魅力和美学价值。每一种声音都让我们听见力量,而声音的力量会照亮我们的思想。对听觉叙事的关注与考察是叙事研究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只有融合视听感官去感受和体验叙事中的丰富世界,“聆听”叙事中的复杂而又微妙的“声音”,我们才能更好地感知和理解叙事的多重价值。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and Self-identification: on Auditory Narration in *Bumblebee*

DENG Gui-ying

(School of Humane Studies,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gtan 411201, China)

Abstract: In the narrative text of *Bumblebee*, Peter Handke creates multiple narrative voices through the transformation of multiple person perspectives and the simultaneous integration of individual narrative voices and authorial narrative voices, at the same time, by means of the creation of rich sound imagery, makes the work present a variety of sound landscape. Peter Handke integrates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with self-identification, hides unique soundscapes in the tracing of memory, and connects individual feelings with the inner reality and history, thus explores the significance of history, actively seeks for a new individual identity and national identity, showing a very broad internal performance space.

Key words: *Bumblebee*;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self-identification; auditory narration

(责任校对 王小飞)

①彼得·汉德克:《大黄蜂》,聂军译,载《无欲的悲歌》,顾牧、聂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48页。

②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韩震等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

③彼得·汉德克:《大黄蜂》,聂军译,载《无欲的悲歌》,顾牧、聂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74页。

④浦安迪:《中国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6页。